

从岸本能武太到章太炎： 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

彭春凌

摘 要：19 世纪下半叶，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引发的社会问题，令偏向个人主义的斯宾塞社会学说遭到质疑，并引发关于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关系的深入思考。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欧美学界的思考以学术译介的方式传入日本和中国，并因文化传统、话语体系、时政背景以及学者个人因素的差异而发生流变。岸本能武太《社会学》在斯宾塞社会有机体说基础上，以“非社会性”对译人类反抗社会秩序的“反社会性”特征，在缓解斯宾塞个人自由观念给日本社会带来紧张感的同时，借此对抗日本日益膨胀的国家主义思潮。章太炎通过翻译岸本《社会学》，将个人自由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逃群”、“隐”、“废”等理念勾连，以“出世”方式抵抗清末新政，为革命提供思想和理论支持。

关键词：岸本能武太 章太炎 斯宾塞 近代社会学 自由

引 言

19 世纪中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使得欧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因此，“什么才是能够使自由最大化的最佳秩序”，成为 19 世纪孔德、斯宾塞奠基的近代社会学关心的基本问题。^① 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思想，在充分吸纳当时

^① 参见彼特·沃森：《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胡翠娥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年，第 920 页；T.M. 波特、D. 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 7 卷，王维等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第 285—309 页。

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考古学、人类学等成果基础上，以社会进化观念，讲述人类社会从诞生到法律、宗教、风俗等各项文明逐步演进的普遍历史，分析社会的结构和功能，可谓“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① 因其宏大的文明视野和理论构架，斯宾塞社会学在 19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国、日本引起强烈反响。^② 斯宾塞运用生物进化论构筑新的“人的哲学”，结合社会有机体说，宣传偏向个人主义的自由理念。伴随着社会学的流行，这些理念也参与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社会变革之中。

在西学东渐大潮推动下，通过英语直译和经日本编译本之转译等多种渠道，斯宾塞社会学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③ 中国知识界一方面震惊于社会学“上下千古，旁罗万象”、“合各种无形有形之学于一炉而冶之”的特点；^④ 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引介这一学科来更新国人思想。1902 年，章太炎翻译的日本学者岸本能武太著《社会学》由广智书局刊行。这是中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⑤ 章太炎指出，其看重岸本《社会学》“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这一基本观点。^⑥ 在古代中国，通常是把“人”置于君臣、父子、兄弟（长幼）、夫妇、朋友——五伦的秩序关系中来定义和把握的。^⑦ 章太炎的上述观点表明，在向现代文明转轨的过程中，儒家的个人自由与秩序的思想也在发生某种因应和调整。

① 严复：《译〈群学肄言〉序》，《严复全集》卷 3，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 年，第 7 页。

② 社会学（sociology）进入日本之初，被译为世态学、交际学，1882 年乘竹孝太郎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之原理》后，“社会学”这一译名才被固定。

③ 参见韩承桦：《斯宾塞到中国——一个翻译史的讨论》，《编译论丛》第 3 卷第 2 期，2010 年；阎明：《中国社会学史：一门学科与一个时代》，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

④ 《〈群学〉原名〈社会学〉》（广告页），《新民丛报》第 14 号，1902 年 8 月 18 日，北京：中华书局，2008 年影印本，第 1751 页。1895 年严复《原强》将斯宾塞社会学译为“群学”，认为其学术内涵是“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事”。（严复：《原强》，《严复全集》卷 7，第 16 页）《新民丛报》广告推荐章译《社会学》时颇依违其间，称《群学》原名《社会学》。章太炎的翻译风格是直接引入日语汉字词组，并且他认为社会学不能仅阐发人伦，还必须推动社会进步。岸本对社会学的定义是，“社会（学）者，先研究现在过去之社会，而发见其要素、性质、起原、发达与其目的；次论组织社会之个人，将来以何方法促进社会之进化，贯彻人类生存之目的”。（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62—63 页）这些促使章太炎坚定采用了“社会学”的译名。关于“群学”和“社会学”的名称在中国的演变，另可参见张超：《从“群学”到“社会学”：近代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形成与演变》，《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2012 年第 1 期。

⑤ 参见《孙本文文集》第 9 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第 263 页；姚纯安：《社会学在近代中国的进程（1895—1919）》，北京：三联书店，2006 年，第 53—58 页。

⑥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45 页。

⑦ 建部邈吾：《社会学》，东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01 年，第 65—66 页。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标志着日本以解析有机体与强调心理主义为特征的社会学第二阶段的开端。它是在借鉴英美社会学的基础上创作而成，充当了英美社会思想进入中国的重要媒介。因此，要准确理解岸本《社会学》中社会有机体说、人的“非社会性”属性以及相关理论话语对章太炎的影响，就必须将太炎与该书的关系，置入更宽阔的视域中考察。这一关系其实是“自由与秩序之思”经历跨大西洋（由英至美）的共享知识话语，到跨太平洋（从美到日再到中）的思想流通，在时代的演进中，逐次变形调整的一环。具体说，岸本编撰《社会学》的初衷是向东京专门学校的学生讲授这门新兴学问。他除借鉴斯宾塞社会学说外，还取用了美国第一部社会学专著——莱斯特·沃德的《动态社会学》。沃德反思斯宾塞自由放任理念，以便重新建构美国内战之后的自由主义。而在日本，现代学术界和思想界“成为关心的中核者，实乃社会学”。^①岸本分析“社会有机体”说及人的“非社会性”要素，一方面有对斯宾塞理念的继承与调整，另一方面也寄予了改良日本社会的期望。在中国，章太炎翻译该书的目的在于向中国知识界介绍有“有掩袭百流一炉同治之势”的新兴“社会学”。^②因此，太炎在完整呈现原作章节的基础上，以大体贴近原作的方式完成了翻译工作。当然，翻译活动一方面是将译作置入新的文化语境；另一方面，由于译者理解的偏差或主观上的“创见”，也令译作局部有增删改写或意义转换的现象。通过对岸本著作的介绍和微调，太炎也投射了清末政治社会革命的愿景，并扩充了自己思索现代社会秩序的理论武库。

在各自社会饱含冲突和危机的时刻，上述英美日中各国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和连锁反应的“社会学”，都反映了著/译者通过解析“人”来再造秩序的憧憬。然而，即便是日本研究界，也缺乏对岸本《社会学》文献来源、思想取向的辨析。岸本《社会学》实为章太炎接受明治思潮的重要一脉。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严肃讨论岸本《社会学》与章太炎思想的专著迄今阙如。^③故此，笔者拟从思想跨洋传播的视角，对以上问题试作探讨。

一、岸本能武太对英美社会学思想的承袭和调整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的诞生有着深刻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从学术传播层面来看：南北战争结束后，斯宾塞社会学在美国迅猛传播；哈佛大学毕业生芬诺洛

① 下出隼吉：《明治社会思想研究》，东京：浅野书店，1932年，“序”，第1页。

② 《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第3037页。

③ 韩承桦《从翻译到编写教科书——近代中国心理倾向社会学知识的引介与生产（1902—1935）》一文讨论了章太炎译本所据原作底本的相关问题，尚未谈及太炎译作对原作的变形、修改以及岸本著作与太炎思想的关系。（张仲民、章可编：《近代中国的知识生产与文化政治——以教科书为中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26—152页）

萨 1878 年受聘东京大学，成为该校最早的哲学教授之一，随后与外山正一共同鼓吹斯宾塞社会学。1883 年，美国社会学家莱斯特·F. 沃德出版《动态社会学》，并于 20 世纪之交风靡一时。1888 年，《动态社会学》被译介到日本。这些主张各异的社会学思想汇聚一时，共同构成了岸本社会学思想的理论资源。从政治层面来看：明治十四年（1881）政变后，大隈重信被迫下野，其开设国会的激进主张遭遇挫败。他于 1882 年成立了立宪改进党，倡导“以改良内治为主，兼及国权扩张”；同年，他帮助小野梓成立了东京专门学校（1902 年改名早稻田大学）。由于大隈、小野都推崇英国立宪政治，所以该校的学术风气也倾向于英国流的政治学，岸本能武太以及曾留学美国的浮田和民、安部矶雄相继进入该校任教。他们都是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社会思想家。面对城市化急剧发展和贫富两极分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他们认为社会进步不能任由自然进化，必须通过改革和学术的方法来促成社会进步。^①

岸本能武太于 1880 年进入同志社英学校普通科学习。1890 年至 1894 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学习比较宗教学，并皈依上帝一位论派，回国后进入东京专门学校任教。章太炎翻译的《社会学》是岸本 1896 年在该校的讲义，^②体现了岸本的社会改良立场。该作立足于社会有机体说进行了颇有组织的论述，表明日本社会学走出草创期，进入了体系化著述的阶段。^③

总体来看，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企图调和“静止的社会学”与“转动的社会学”两大社会学流派。前者侧重于描述社会进化之历史事实，故称“静止的社会学”，以斯宾塞为代表；后者重视研究社会进化之原因、找到推动社会进步之方法，故称“转动的社会学”，以沃德为代表。章太炎译文曰：“利他哀夫欧尔德之社会学重在转动”，“有意于助长社会者矣”。^④“利他哀夫欧尔德”即莱斯特·F. 沃德，岸本译为“レスター・エフ・ウォールド”。^⑤沃德继承斯宾塞的观念，将社会视为

① 参见《早稻田百年と社会学》編集委員会：《早稻田百年と社会学》，東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83 年，第 11—14 頁。

② 章太炎翻译的版本是岸本能武太講述：《社会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刊年不明。该书封面标“東京専門學校文學科三年級講義録”字样。该书还有另一版本：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東京：大日本図書株式会社，1900 年。根据该版《绪言》，“讲义录”版《社会学》是作者 1896 年在东京专门学校任教时的讲义。为便于区分，以下分别称“1896 年讲义版”与“1900 年版”。

③ 松本潤一郎：《日本社会学》，東京：時潮社，1937 年，第 7—8 頁。

④ 参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60 页；岸本能武太講述：《社会学》（1896 年讲义版），第 26—27 頁。

⑤ 章太炎虽然音译出了沃德的名字，但对沃德《动态社会学》及岸本受该书影响的情况，并不十分清楚。他在《〈社会学〉序言》中还误认为岸本受弗兰克林·吉丁斯（Franklin H. Giddings，太炎译作“葛通哥斯”）的影响。

自然发生、与自然秩序相持续,并服从于进化的宇宙法则的统一整体。^①岸本亦贯彻斯宾塞、沃德之宗旨,从日球系统、地球、生物之进化,论及人类以及真善美道德之发达,以宇宙自然演进的立场来理解社会进化。并且,岸本《社会学》中涉及人的进化和社会起源中“静态”的部分,比如原人的身体特征、情感心理状态,社会进化中供给、分配诸系统的分化和发达等,取自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而涉及社会目的,即认为“社会究极之目的,在为个人幸福谋其圆满具足者”,以及主张以教育为核心手段促进社会的进步等,属于社会“动力”学的部分,借鉴了沃德《动态社会学》。这部分内容,恰恰是沃德面对内战创伤和镀金时代史无前例的工业发展带来的种种问题,针对斯宾塞学说的反思性成果。沃德希望为美国公众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即通过理性和计划,遏制资本主义造成的急剧的贫富和阶级分化。此外,岸本还参考了英国哲学家约翰·麦肯齐的《社会哲学绪论》。^②从思想跨洋传播的历史脉络来看,岸本《社会学》其实位于英、美、日之间密切而即时的知识传播链条之中。岸本赞同沃德的政治改革立场,主张社会学要有利于改革事业。

章太炎夸赞岸本《社会学》“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③无论“非社会性”,还是“以社会拟有机,而曰非一切如有机”,均包含着岸本能武太对斯宾塞社会学理念的承袭和调整。

岸本《社会学》根据社会进化学说来演绎人类文明之进程。社会的出现是原人进化至较高阶段的产物,因此,社会的兴起不仅“不与生民同时”,并且必定晚于生民的出现。而尚未形成社会时,人类“皆独立生存”。换言之,好离散的独居之性亦即“非社会性”,先在于“恶独居而好群居”的“社会性”。社会形成之后,人的“非社会性”并未消失,而是一直与“社会性”共存。在岸本看来,“非社会性”的根本性,不仅关涉社会进化论的存亡,而且确保了个人先于社会的优先性。^④

岸本的分析,可从沃德《动态社会学》中找到来源。沃德认为,在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人类很大程度上是独居或小团体生存。^⑤他拒绝接受人为“天然的群居动物”这一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并被孔德《实证哲学讲义》强烈捍卫的理念。在他看来,达尔文《人类的由来》以人为“天然之社会人”也缺乏客观性。文明人身上的社会人品格,乃是漫长的制度塑造的结果。沃德指出,“在自然状态下,人类全然

① Daniel Breslau, “The American Spencerians: Theorizing a New Science,” in Craig Calhoun, ed., *Sociology in America: A History*,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p.40, 49–50.

②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282页。

③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45页。

④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79、112页。原文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82、188页。

⑤ Lester F. Ward, *Dynamic Sociology*, Vol.I, New York:D.Appleton and Company, 1883, p.464.

并非社会性存在物”。而斯宾塞《第一原理》《心理学原理》以及赖尔《地质学原理》早就认识到人的各种“反社会趋向”(anti-social tendencies)。^①

斯宾塞《第一原理》强调“政府行为”与“人民欲求”之间的动态平衡。因为人的攻击性冲动继承自前社会状态，“这类寻求自我满足而不顾及伤害他者的趋向，是捕食者的生活所必须的；它们构成了反社会性的力量，永远趋向于引起冲突，并导致公民间的分离”。另外，人还具有“其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于联合体的欲求，通过与同胞交流才能满足的情感，以及那些产生我们称为忠诚的东西”；此类社会性品格推动社会的凝聚与团结。每个社会都在人的攻击性冲动引发的“斥力”和人的社会性品格带来的“引力”这两种力量的动态平衡中前行。^②无论是斯宾塞还是沃德，人的“反社会性”都是他们偏向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理念的基础。

值得玩味的是，岸本能武太偷换了关键译词。在斯宾塞、沃德的著作中，与“社会性”构成正反关系的是“反社会性”(anti-social)。岸本很清楚这一点。岸本《社会学》反驳社会性乃社会起源的肇因，提到“纵令原人有社会性，同时亦有非社会性”。^③这里的“非社会性”，岸本日文原著写作“非社会的性情”，并在这一词组旁以片假名词组“アンチ、ソーシャル、フィーリングズ”标注对应的英文词组“anti-social feelings”。^④据井上哲次郎1883年增订版《英华字典》，“anti”作为前缀词，意为“against”，可译为“敌、反、背、违”。但岸本译为“非”。“非社会性”对应的英文原词是unsocial。Unsocial意为“不与人交通、不喜交接”。^⑤换言之，岸本用表示以消极不合作方式达成“反社会性”的“非社会性”一词，替代了意指积极主动、争取个人利益和权利的“反社会性”。而这个译词又直接进入章太炎的中文译本。岸本能武太认为，“我国原非个人主义之国家也”，“(日本国民——引者)为子者，为亲而生；为妻者，为夫而生；为臣者，为君而生”，^⑥对个人幸福有所觉悟者极少。用“非社会性”替代“反社会性”，虽一字之差，却更有利于让个人主义传统不发达、重视集体秩序的日本社会接纳斯宾塞的思想。

岸本以麦肯齐《社会哲学绪论》为依据，归纳既有的五种社会性质学说。他首先批判了社会多元说、一元说、器械说以及化学说，^⑦赞同将社会类比为生物的“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说——在西方，把社会比作有机体很有历史渊

① Lester F. Ward, *Dynamic Sociology*, Vol.II,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88, pp.221-222.

② Herbert Spencer, *First Principles*,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7, p.511.

③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12页。

④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192页。

⑤ 罗布存德著，井上哲次郎订增：《订增英华字典》，东京：藤本氏，1883年，第42、1139页。

⑥ 岸本能武太：《伦理宗教时论》，东京：警醒社，1900年，第14页。

⑦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282、303页。

源。^①章太炎赞赏岸本一方面“以社会拟有机”，即承认社会与有机体之间的诸般相似性；另一方面又倡言“非一切如有机”，即强调社会与有机体的根本区别。岸本虽略有发挥，但几乎原封不动地继承了斯宾塞的观点。

岸本《社会学》所论社会与有机体的几个相似点，绝大部分脱胎于斯宾塞《社会有机体》与《社会学原理》的结论。^②

第一，岸本所论两者皆“自同化而成长，自分化而发达”，^③愈发达愈复杂，其实概括了斯宾塞所言社会与有机体若干相似点：（1）都表现出明显的质量增加即成长的过程；（2）与规模增长相伴的是结构的发展，表现在各自组成部分的增加和分化；（3）结构的进步分化又伴随着功能的进步分化，以及不同器官拥有不同职能的多元化取向。^④

第二，岸本所论“全体之生命作用，为部分所不与知”，以及“一部分之变化，其影响及他部分，遂致全体之变化”，^⑤是对斯宾塞所说的有机体各器官的差异性功能、社会的劳动分工维系了整体的运作，而各部分彼此联系、相互依赖这一观点的具体化。在斯宾塞看来，这是有机体与社会相似点的“基本特征”。而岸本指出，如同躯体的头疼、肺炎导致全体为病体，商业崛起有利于全社会；“社会的诸部分如同有机体的诸部分，随着分化程度的增进，相互依赖的程度也随着增加”。这些事例和总结，均能在斯宾塞《社会学原理》中找到相应出处。^⑥

第三，岸本所论“部分之寿在一时，全体之寿在永久”，承袭了斯宾塞所论集体生命要远远超过组成它的个体；个人有生长、繁殖与死亡，社会则长存。

但是，岸本所论“存在目的在本体之内部”，认为有机体的目的在维系自身的生长与种族的保存，与此相类，社会之目的“专为本体之内部，而非为社会以外”。^⑦这一项却不见于斯宾塞的论述，而是岸本为分析社会与有机体的差异时挟带些许“私货”所作的铺垫。

岸本《社会学》指出，社会与有机体有两个差异。

首先，“组成社会之众人乃各自主自由而有意识、有理性之动物，于此，社会与有机体不相同也”。^⑧此项较准确归纳了斯宾塞的观点。斯宾塞认为，生物有机

① 参见 Lester F. Ward, *Outlin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898, p.49.

② 参见 Herbert Spencer, “The Social Organism,”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 Speculative*, Vol. I, 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868;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2007, pp.96–97.

③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1页。

④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p.96–97.

⑤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0页。

⑥ 参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06页；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I,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898, p.452.

⑦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1页。

⑧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11—312页。

体的意识集中在集合体的一小部分，而社会集合体是分散的，它的所有个体都有意识，都“拥有欢乐和悲伤的能力”。高等动物有感觉中枢，社会却“没有社会感觉中枢”（no social sensorium）；“社会为了成员的利益而存在，并非成员为了社会的利益而存在”。^① 斯宾塞从社会有机体并无感觉中枢出发，否定将个人福祉从属于集体利益的观念，从而“保持了他的对个人主义与放任主义”在方法上和政治上的承诺。^② “sensorium”乃斯宾塞的重要理论话语，乘竹孝太郎译为“感受官”。^③ 岸本能武太并没有直接翻译“no social sensorium”，而是从侧面论述生物有机体（主要指人的身体）拥有感觉中枢（脑髓脊髓），来反比社会的情况。即与人体不同，社会没有感觉中枢，“社会之部分，非如身体之部分，固著不动且无意识也；今夫百体之感觉，皆自神经脊髓发之，非能自有所觉，手足之动，非其自动，离于全体，则与瓦石等耳”。^④ 易言之，与身体各官能受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不同，组成社会的每个个体，各自具有生命、意识、理性与自由。

岸本所论第二个差异不是来自斯宾塞，而是他自己的阐发。如前所述，岸本罗列社会与有机体相似点，还在于两者的存在目的皆在本体之内部。他埋下这一伏笔，是要在相异点中点明，社会“无本体以外之存在目的”，但人体除了维系躯体存在的目的外，还有“自己以外”的存在目的。他指出，身体是“灵魂的住所”（靈魂の住處），^⑤ 身体在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外，还需要满足精神需求。斯宾塞仅从生理学层面考虑有机体，岸本却把问题延伸到人对精神生活的追求。

事实上，19世纪末，无论在英美还是日本，斯宾塞植根于个人主义、推崇自由放任、对政府的调节作用持消极立场的社会有机体学说，已受到广泛批判和质疑。赫胥黎1871年发表的《行政的虚无主义》认为，斯宾塞以有机体来比拟社会，不仅不能支持他的自由放任理念，还适得其反，“彻底反对了关于国家功能的负面观点”，陷入自相矛盾。因为对身体而言，神经系统才是控制中枢，若没有神经系统的干涉，肌肉自由收缩、腺体自由分泌造成的生理伤害将不可想象。若以生物体与政治体类比，与有机体的神经系统对应的只能是社会集合体中的政府。社会有机体意味着应有“比现存的更大规模的政府干涉”。^⑥ 斯宾塞随即发表《专门化的行政》予以回应，指出内脏各功能通过神经节彼此联系、合作，从而保证它们相对独

① Herbert Spencer,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Vol. I, pp.461–462.

② T.M. 波特、D. 罗斯主编：《剑桥科学史》第7卷，第288页。

③ スペンセル：《社会学之原理》第6册，乘竹孝太郎訳，東京：経済雑誌社，1884年，第35页。

④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2页。原文参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13页。

⑤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14页。

⑥ Thomas Huxley,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Fortnightly Review*, New Series, Vol.X, November 1, 1871, pp. 534–535.

立的运作,即便损害或缺失了高等神经中枢,机体的消化和循环系统也可正常运作。^①有研究者指出,斯宾塞与赫胥黎在社会有机体认知上的差别,源自不同的生物学视野和政治目标。简言之,受颅相学、环节动物、海洋无脊椎动物等知识的启发,斯宾塞用以比拟社会的有机体,是诸如蜈蚣、蚂蟥、水媳、管水母等低等动物,各个分段的神经节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复合个体形式存在。而赫胥黎反对“复合个体性”的说法,他认为“一个有性生殖的受精卵的完整产品”才能称为个体,即他用以比拟社会的有机体是高等脊椎动物。^②

就英国的文化氛围而言,大约在1875年之后,英国科学界的话语朝向民族主义、军事战备、爱国主义、政治精英主义等集体主义价值转移。^③赫胥黎式的关于社会有机体的认知愈益盛行,费边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甚至将该概念作为扩大政府职能的依据。^④而在美国,沃德所在的华盛顿知识圈普遍意识到,为适应高速工业化及无组织社会的现状,需要建立一种扩大政府功能、不同于放任假设的新的社会治理哲学。“在华盛顿猛击斯宾塞”(Spencer-Smashing at Washington)成为19世纪末的风尚。^⑤在对社会有机体的认知上,沃德坚定站在赫胥黎一边,认为神经系统才是社会与有机体相比较时“第一且唯一合适的”项目。如缺乏神经系统的控制,有机体将整体停摆。沃德呼吁,当前的社会应努力达到哪怕如低等动物所表现出的低阶段的整合能力。^⑥

就岸本所处时代的英美社会思潮发展趋势而言,岸本能武太举起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大旗,为个人主义辩护,不免有反潮流之势,置于日本当时的社会环境观察,更显得不合时宜。

1882年,加藤弘之发表《人权新说》,批评天赋人权论,倡导实力权利论和国家有机体学说,继而引发“明治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激烈的一场论战”。^⑦1890年,《教育敕语》颁布,标志天皇制绝对主义在制度和思想上获得了压倒性胜利。在当

① Herbert Spencer, "Specialized Administration," *Fortnightly Review*, New Series, Vol.X, December 1, 1871, p.640.

② 详细讨论参见 James Elwick, "Herbert Spencer and the Disunity of the Social Organism," *History of Science*, Vol.41, No.1(March 2003), pp.35-72.

③ Frank M. Turner, *Contesting Cultural Authority: Essays in Victorian Intellectual Lif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205.

④ Michael W. Taylor, *The Philosophy of Herbert Spencer*, p.98.

⑤ "Spencer-Smashing at Washington," *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 April 1894, pp.856-857. 另可参见 Edward C. Rafferty, *Apostle of Human Progress: Lester Frank Ward and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1841-1913*,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203.

⑥ Lester F. Ward, *Outlines of Sociology*, pp.60-62.

⑦ 近代日本思想史研究会:《近代日本思想史》第1卷,马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9页。

时的日本，“个人主义的自由民权思想被国权主义的社会有机体学说所克服”。^① 斯宾塞向个人主义敞开的社会有机体学说之本旨渐趋淹没。东京大学教授外山正一曾留学英美，一度号称“斯宾塞轮流朗读者会的看门人”。1896年，外山已改弦更张。他发表《关于人生目的的我信界》的讲演，主张“个人存在的目的，并非在个人自身，而是在个人所附属的团体”。^②

岸本《社会学》将社会究极之目的定义为“为个人幸福谋其圆满具足者”，将人生究极之目的定义为“任受完具之幸福”，明显是与外山正一的观点分庭抗礼。1900年，岸本撰述《伦理宗教时论》，仍将外山《关于人生目的的我信界》作为批判的靶子，谓“博士议论的短处和缺点，实此埋没个人的倾向”。岸本所倡导的个人主义，乃是“与社会生活没有直接关系的”、属于“个人生活范围”的所谓“人生的个人余裕”（人生の個人的余裕），指向灵魂得以圆满的宗教生活。^③ “人生的个人余裕”一直都是岸本个人主义论说的关键用语。《社会学》批驳以全体为目的、忽视个体的社会一元说（Monism），也同样使用这个用语。太炎译为“个人各有其余裕”。^④ 作为基督徒，岸本在日本社会生活中总是体验着难言的、被排斥的压力。他以反抗的姿态，批评排他主义、孤立主义、锁国攘夷思想。然而，岸本执着于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相割裂的私人的宗教体验，还必须在明治国体的框架中展开论述，称“离开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就没有安定的国家主义”。^⑤ 这些都与他将“反社会性”译为“非社会性”一样，表明其消极抵抗的特征。

章太炎翻译《社会学》时所能接触的日本人自著“社会学”作品，以个人主义为诉求者，可谓凤毛麟角。如浮田和民《社会学讲义》（1901）对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本旨体察深刻，谓“斯宾塞的社会学以个人主义为目的”。然而他指出，今日的社会学，在脱生物学的同时，又在脱个人主义，社会学宜取沃德的立场，“立脚点应该在社会”。^⑥ 外山正一的两名学生——远藤隆吉与建部遯吾，是当时重要的社会学家。远藤隆吉认同赫胥黎对社会有机体的判断，即“个人是社会的一个机关，是全体的机关的一部分。如无全体，则个人不能存立，纵然存立，亦大异其趣”，“社会是个人的目的”。^⑦ 建部遯吾1901年从欧洲留学归来，作为外山接班人，担任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开启了“建部社会学的统治时代”。^⑧ 建

① 清水幾太郎：《日本文化形態論》，東京：サイレン社，1936年，第96頁。

② 外山正一：《、山存稿》，東京：丸善株式会社，1909年，第33、617頁。

③ 岸本能武太：《倫理宗教時論》，第28頁。

④ 岸本能武太講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289頁；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36頁。

⑤ 岸本能武太：《倫理宗教時論》，第18頁。

⑥ 浮田和民：《社会学講義》，東京：開発社，1901年，第69—70頁。

⑦ 遠藤隆吉：《現今之社会学》，東京：金昌堂，1901年，第59—60頁。

⑧ 松本潤一郎：《日本社会学》，第8頁。

部邈吾 1901 年出版讲义录《社会学》，明确站在国家社会一方，将个人主义视为草昧时代的形态，批评将个人主义作为理想“乃颠倒事理”。^① 章太炎自称“日读各种社会学书”，阅读过浮田和民《史学原论》、远藤隆吉《支那哲学史》及其所译吉丁斯《社会学》。^② 建部《社会学》与岸本《社会学》同为东京专门学校的讲义，其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容量更足以使读者侧目。太炎几乎不可能没有涉猎浮田、远藤、建部各自撰述的“社会学”。那么章太炎格外钟情并翻译这本“另类”《社会学》的契机或原因是什么？

二、章太炎翻译《社会学》之前的思想动向

章太炎表彰岸本《社会学》，谓“知人类乐群，亦言有非社会性，相与偕动”。从字面上看，这当然是强调乐群的社会性与喜独的非社会性均为人性之一端。如果将这一观点置于太炎自身思想演变的历程中来观察就会发现，“乐群”、“合群明分”作为荀子学的中心思想，是包括《馗书》初刻本（1900）在内的太炎早年著述的核心要义。序言这句话恰恰彰明“非社会性”在太炎思想中的地位获得了上升，甚至达到可与人之“乐群”属性分庭抗礼的程度。理解太炎思想的这一新趋向，需作一番回顾。即在接触岸本《社会学》之前，太炎解析群独关系，从 1894 年的《独居记》，到以该篇为原型、收入《馗书》初刻本的《明独》（1900），要点均在“大独必群，不群非独”。^③ 所谓“独”并非人的“非社会性”，因为它内在于“群”以及“乐群”，太炎讨论的乃是交织于社会性关系中的个体该如何发挥积极作用。《馗书》初刻本并置《明群》和《明独》，也并不隐含“群”与“独”的对峙。

《明群》认为，“一人不兼官，而离居不相待则穷”，即个人难以兼任不同的生产劳作而获得足够丰富的生活资料，因此才产生了社会（群）。君者“群也”，“立君”是为了解决“人相争”的问题。《荀子·富国》云：“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穷矣。故无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大）利也；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枢要也。”^④ 太炎认为，开设议院，或将面临政出多

① 建部邈吾：《社会学》，第 338—339 页。

② 参见《章太炎来简》，《新民丛报》第 13 号，1902 年 8 月 4 日，第 1677—1678 页；章太炎：《序种姓上》、《订孔》，《章太炎全集·〈馗书〉（重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170、132 页。

③ 章太炎：《独居记》，《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 页；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 53 页。

④ 王先谦：《荀子集解》，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第 212 页。

头、各种利益团体干扰执政等问题，因此并非变法之急务。变法初期君主应依靠谋士来推行集权。该篇末尾暗讽慈禧幽禁光绪帝，造成国家实际君主与形式君主双君（两群）并存的困局，谓“一国有两群，则不可以出政令”。^①《明群》体现了太炎戊戌（1898）、己亥（1899）之间“与尊清者游”的变法思想。^②随着日后其政治立场转向革命，1904年出版的《馗书》重订本便删掉了《明群》篇。

原型为《独居记》的《明独》篇，重点却并非表彰脱离于社会之外的个体。《明独》首先批评鸷夫、嗇夫、旷夫三种“不群”之“独”。如果说好勇斗狠的“鸷夫”之“独”，乃是“反社会性”人格的呈现，那么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嗇夫”之“独”，与幽居山林、旷达闲适的“旷夫”之“独”，则更多地呈现了消极的“非社会性”人格。在太炎看来，无论“反社会性”还是“非社会性”之“独”，由于不具备“乐群”的社会性特点，是不能荣享“独”之名的。这意味着必须基于“群”言“独”。太炎欣赏两种所谓的“独”，即“独而为群王”的英雄领袖人物，和“其性廉制，与流俗不合”但一心为公、替寡弱者主持正义的狷介之士。这两种所谓“独”，都代表人类推动群体良性发展的社会性品格。^③

一般来讲，儒家将社会属性作为包裹着人的前提性存在。不同儒者或许在体悟和实现自身社会属性的方式上有所差异，但都不背离于在五伦关系中定义人的宗旨。^④正是基于这一立场，太炎不满“嗇夫”、“旷夫”的“非社会性”，不认同他们以自我为本位而不关注群体的思想及行为。

1898年，章太炎和曾广铨合译了《斯宾塞尔文集》。其中《论礼仪》一篇的原作《礼仪与风尚》，集中展现了斯宾塞以个体为本位的自由主义思想。从太炎译文对相关段落的处理，也能够窥见他彼时的思想取向。一方面，译文有几处比较准确地呈现了原作对自由的诠释，表明至少从字面上，太炎对斯氏学说的相关意涵有所了解。比如斯宾塞指出，人有热爱自由、挣脱限制的天性，太炎译相关语句为“人情好自由，不甘钳制，故有畔犯之举，而败已行之风”。^⑤斯宾塞处理社会关系的“第一原理”，是“每个人都有做一切他愿做的事的自由，只要他不侵犯任何他人的同等自由”。^⑥《礼仪与风尚》也有类似论述，太炎的译文是，“凡事必协于理，而

① 章太炎：《明群》，《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第51—52页。

② 章太炎：《客帝匡谬》，《章太炎全集·〈馗书〉（重订本）》，第120页。

③ 章太炎：《明独》，《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第53—54页。

④ 参见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龚颖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年，第173—174页。

⑤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礼仪》，《昌言报》第8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第450页。斯氏原文参见 Herbert Spencer, “Manners and Fashion,” *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 Speculative*, Vol. I, p.93.

⑥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节略修订本），张雄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2页。

平其等。必使人各自由，各自求其所好，各不侵占权利，彼此无犯”。^①

另一方面，斯宾塞鼓励人打破既有的社会秩序，太炎对此心存疑虑。斯宾塞认为，法律、宗教和礼仪，作为治理社会的人为设施，有着共同的历史起源。法律和宗教从根本上、礼仪从细节上管理人的行为，它们都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人类摆脱奴役状态、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意味着抵抗专制权力，开创民众政治，否定教会权威，建立个人判断的正当性。斯宾塞表示：“所有类型的治理都是为不适应社会生活的原始人而设置的，而治理的强制性是与他们的不适应性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当人类对新的条件获得完全的适应性时，它们一定全都会走向终结。”^② 斯宾塞以个人自由为本位，将所有社会规则相对化和外在化。

在太炎看来，朝廷之制、庙堂之典、会同之仪只有在不符合正义和道德规范的情况下，才是“齷齪苛礼”。用“义无所取”^③ 的规则进行治理，才算“限制人人自主之权”。这与斯宾塞将所有正式的或事实上的规则都视为对人自由的限制是不同的。导致其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太炎所继承的荀学原本立足于群体的和谐来理解个体价值，即所谓“合群明分”，个体是作为群体之一分子的个体。而人性之恶需要外在的礼法来进行矫治。因为人性本恶的普遍事实永难改变，礼仪规范永远具有存在的理由，其宗旨在于生命个体之化性起伪、实现道德善。这又与斯氏认定经过漫长的进化人性终极能够达于至善相左。

易言之，无论是章太炎的个人作品《明群》《明独》，还是其译著《论礼仪》，“乐群”的社会性是早年太炎思考人的出发点。尽管如此，通过这次翻译，他对斯宾塞的学说已有所了解。在另一位译者曾广铨的帮助下，他将 freedom、liberty 灵活地对应于“自由”或“自主”，^④ 且把“自主”和“自由”当作褒义性的同义词。虽然来华新教传教士早就在中国境内将英语的 liberty 译作“自由”或“自主”，^⑤ 但从中国知识界来看，章太炎几乎与严复、何启、胡礼垣等较早接触英语圈文化的启蒙先驱同时甚或略早地在肯定意义上实现了 liberty、freedom 与“自由”和“自主”的对译。这些都为他在翻译《社会学》时理解岸本能武太社会学思想，作了理论上的铺垫和准备。据朱维铮考证，1900年2月中下旬《卮书》初刻本付梓，

①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礼仪》，《昌言报》第8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第451页。原文参见 Herbert Spencer, “Manners and Fashion,” p.93.

② Herbert Spencer, “Manners and Fashion,” p.92.

③ 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礼仪》，《昌言报》第5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第266页。“义无所取”为译文添加，斯宾塞原文无。Herbert Spencer, “Manners and Fashion,” p.64.

④ 参见曾广铨采译，章炳麟笔述：《斯宾塞尔文集·论礼仪》，《昌言报》第8册，《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329，第451页。

⑤ 参见冯天瑜：《新语探源——中西日文化互动与近代汉字术语生成》，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55页。

1900年夏秋之间《馗书》初刻本推出了再版本亦即补佚本。补佚本多出了《辨氏》与《学隐》两篇，一瞥内容，便可发现“不再是‘与尊清者游’的口吻”，“作者对清朝的态度已有变化”。^①

道咸以降，经世思想渐成主潮，学界持续反思以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等为代表的乾嘉之学的流弊。如魏源、康有为都将“无用”视为乾嘉汉学的最大耻辱。^②《学隐》开篇以魏源《李申耆传》的论述作标靶，其实则是要与彼时士林的类似认知开战。太炎提示，要依据政治历史环境亦即“世”之是否“有望”、“可为”，来判断“用”的真伪。在具有道德正义性的“用”没有施展空间的时代，施于训诂、穷老笺注的“无用”就是合理选择。^③《学隐》为戴震所代表的汉学诸公辩白：“知中夏黜黯不可为，为之无鱼子虬虱之势足以藉手；士皆思偷谒禄仕久矣，则惧夫谐媚为疏附，窃仁义于侯之门者。故教之汉学，绝其恢谲异谋。”太炎还在儒学思想内部，为戴震的行为寻找经典依据——“废则中权，出则朝隐”。^④

“废则中权”典出《论语·微子》：“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马融释“废中权”为“遭世乱，自废弃以免患，合于权也”。^⑤谢良佐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则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污也，权而适宜也，与方外之士害义伤教而乱大伦者殊科”。^⑥在乱世之中为免患而隐居避世，符合儒家的经权之道。“隐”虽与儒家的伦理观并不完全契合，却也是儒家认可的行为方式。“朝隐”语出扬雄《法言·渊骞》，中有东方朔之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这也是对《论语·微子》篇的演绎。扬雄承认“隐道多端”，“圣言圣行，不逢其时，圣人隐也。贤言贤行，不逢其时，贤者隐也。谈言谈行，而不逢其时，谈者隐也”。^⑦太炎“学隐”之概括，或受扬雄“圣人隐”、“贤者隐”、“谈者隐”的启发。

①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本卷前言》，第10页。

② 魏源：《武进李申耆先生传》，《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2册，第283页；康有为：《长兴学记》，《康有为全集》第1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③ 《馗书》初刻本（补佚本）、《馗书》重订本、《检论》均有该篇。参见《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馗书〉（重订本）、〈检论〉》第111、161、490页。

④ 章太炎：《学隐》，《馗书》初刻本（补佚本）、《馗书》重订本、《检论》均有该段。《检论·学隐》中“汉学”改为“古学”。参见《章太炎全集·〈馗书〉初刻本、〈馗书〉重订本、〈检论〉》第112、161、490页。

⑤ 参见程树德：《论语集释》，程俊英、蒋见元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284页。

⑥ 参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86页。

⑦ 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83页。

《学隐》的撰写表明,在接触岸本《社会学》以前,太炎已不再固守“乐群”的一元价值追求,尝试从儒家内部寻找支持远离政治的理论依据。这是他关注进而翻译岸本《社会学》的重要契机。

三、章太炎对个人自由观念的发展

1902年,通过翻译《社会学》,章太炎收获了诸如“非社会性”、“消极”等带有个人主义理论色彩的新词汇。通过援引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正统儒学观念中并不光彩的“废”、“隐”之“逃群”(离于社会)进一步获得了正当性。然而,革命活动要求人的积极行动,而且太炎此前已了解并认同斯宾塞的自由理念,在《社会学》译本中,太炎表达了对岸本略微压抑自由之积极面向的不满。此外,岸本详细介绍但持反对立场的以独在之个体为本位的社会“单子说”(Monadism,岸本和太炎都译为“多元说”),与此后太炎“个体为真,团体为幻”的表述极为相似。^①可见翻译《社会学》后,该论述即在太炎思想中潜伏下来。

1898年章太炎与曾广铨合译《斯宾塞尔文集》时,对“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概念并无自觉意识,以至于原作共四次提到这一概念,但译作《论进境之理》和《论礼仪》均未出现。^②借助于岸本《社会学》,章太炎曲折获悉斯氏“社会有机体”说的本旨。诸如“社会”与“有机体”有不相似之处,“非一切如有机”,组成社会的个体拥有独立的意志和自由等说法,令他印象深刻。因为在太炎当时所接触的中文舆论中,无论将“群”还是将“国家”比作“有机体”,大都把“有机体”指向高等脊椎动物亦即人,并且强调群或国家与有机体的相似之处——都具备控制功能的“感觉中枢”。比如严复用“官品”来翻译organism。^③他在《原强》修订稿中说,“盖群者人之积也,而人者官品之魁也”;“夫一国犹之一身也,脉络贯通,官体相救,故击其头则四肢皆应,刺其腹则举体知亡”。^④

得到斯宾塞式社会有机体学说的框架为支持,人在“乐群”取向之外,拥有承袭自原人阶段更本初的“非社会性”的天性,就变得顺理成章。章太炎意识到,岸本《社会学》为《学隐》所陈士人“废”(自我废弃)、“隐”等行止赋予了共有的政治属性的名称——“非社会性”或曰“逃群”,而最能反映“非社会性”政治姿

① 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合订影印本,第3册,第2页。

② 参见Herbert Spencer,“Progress: Its Law and Cause,”*Essays: Scientific, Political, & Speculative*, Vol. I, pp.2,16,55; Herbert Spencer,“Manners and Fashion,” p.84.

③ 在严复早年的《保种余议》《天演论》等作中都能看到“官品”。他曾自述用“官品”译organism的缘故,可参见严复:《政治讲义》(1906),《严复全集》卷6,第19页。

④ 严复:《原强(修订稿)》,《严复全集》卷7,第25、26页。

态的是“消极”。

“消极”、“积极”乃日本兰学创造的和制汉语，原本指电气的阴阳两极。明治初期，在强调悲观、厌世的西洋哲学影响下，“积极”逐渐开始指涉肯定的、正面的心理状态以及进取的行为方向；而“消极”则倾向于指涉否定、负面的心理状态及退守的行为方向。^①从19世纪末开始，“积极”、“消极”作为新语汇传入中国。特别是癸卯甲辰之际，“海上译籍初行，社会口语骤变，报纸鼓吹文明，法学哲理名辞稠叠盈幅；然行之内地，则‘积极’‘消极’‘内籀’‘外籀’，皆不知为何语。由是缙绅先生摒绝勿观，率以新学相诟病”。^②太炎1902年翻译岸本《社会学》，事实上参与了“积极”、“消极”这一波新词汇的引介和推广。除《社会学》外，在太炎同时期译介的姉崎正治《宗教学概论》及其与友人吴君遂的书信中，也都可见“消极”一词。^③太炎译《社会学》勾连“消极”与个人主义指向的“逃群”（离于社会）、“非社会性”，赋予了该词“以不行动为行动”的政治内涵。

岸本指出，厌世论者“对于社会，怀消极绝望之念”，其人生观、社会观是“生存者，楚痛之连锁；社会者，烦恼之渊藪；必灭性逃群，然后可以幸免”。^④太炎此处译文照搬了日文原文的“消極”和“絶望”，并将原文的“人生を絶つ”（弃绝人生）译为“灭性”，将“社會を離るゝ”（离于社会）译为“逃群”。^⑤此外岸本认为，社会改革者的愤世嫉俗，事实上是将希望寄托在将来理想社会的乐天主主义。太炎把岸本的解释意译为“彼虽谓黄金时代不可再见于今，其心犹有所豫期焉。豫期者，固非消极绝望，则凡所以灭性逃群者，特对于客观之今日，而非发于主观之吾心，其心固犹是乐天也”。^⑥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消极”、“灭性逃群”都非原文所有，而是太炎以儒学话语连类格义岸本社会学概念的结果。

1902年夏，章太炎从日本回国，之后开始增改《馥书》，于1904年出版《馥书》重订本。转向革命的章太炎必须面对国内的新政局。《辛丑条约》签订后，列强借“保全主义”之名，行攘夺利权之实。1901年清政府启动新政改革，意图之一为对抗革命。《馥书》重订本新创作了《消极》篇，将《学隐》中学者的“隐”、“废”举动所指向的政治“消极”行为推而广之。太炎寄望社会各界通过“退而守

① 参见王麗娟：《専門語から一般語へと——積極・消極を中心に》，《或問》，No.32，2017，pp.35-43。

② 《辞源》，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影印1915年第1版，“编纂此书之缘起”，第4页。

③ 参见章太炎：《原教上》，《章太炎全集·〈馥书〉（重订本）》，第287页；章太炎：《与吴君遂书》，《章太炎全集·书信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1页。

④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5页。

⑤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27—328页。

⑥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46页。原文参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334—335页。

旧”，令政“日损”，达成“不足以立事而事立”的政治目标。^①《消极》中“清作伪政”、“新军陵轹主人”、“今警察又建矣”等语，矛头所指皆为新政。太炎指出，在外国殖民者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官商勾结的情况下，愈外交、愈通商，所失权益就愈多。^②太炎这些说法呼应了彼时的舆论。比如论者或谓列强变“明瓜分”为“暗瓜分”，“视中国为彼私家之物，中国政府为彼掌产业之家奴”，^③通过保全、操控清政府来盗取中国利益等。太炎认为清政府“伪作新法”的目的仅是维持其腐朽统治，所以助力新政不啻为虎作伥。由此，他倡导广大民众进行“不作为”的消极抵抗，外交“不如绝交”，通商“不如闭关”，军事“不如偃兵”；在清政府倒台后，“积极之政，于是俟载，以辅后王”。^④

岸本能武太创造性地将斯宾塞、沃德作品中原人的“反社会性”(anti-social)，翻译为指向离群索居的“非社会性”。针对明治三十年代以降的厌世思潮，他认为不少逃离社会的消极绝望者，其实憧憬黄金时代于未来，在宗教生活中维系个人空间。其《社会学》为正在发掘“废”、“隐”价值的章太炎提供了社会与有机体不相似，“非社会性”、“消极”等一套理论话语。在清末新政的变局中，太炎进一步将“废”、“隐”扩充为“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消极”抵抗政治，从而发展了个人自由的消极面向。个人主义在跨洋传播过程中，与不同社会、政治环境产生了各种殊色的化学反应。

岸本能武太审慎使用“自由”一词，并批评社会“单子说”(Monadism)。章太炎对这两项内容的特殊处理则意味着，被岸本译文遮挡的斯宾塞、沃德原作中积极主动的个人自由倾向，又被太炎稍显恣意的翻译实践掀了出来。换言之，正在进行革命的章太炎，比岸本的自由主张更加积极。

在岸本眼中，“自由独立”乃智慧的文明人积极主动创造新生活、新风尚的优秀品格，因循姑息、为所欲为、处于进化初级阶段的原人并不具备这项品格。他以在马来半岛、巴西、印度等地所作的人类学调查，来说明放纵致使原人彼此之间分离散处。^⑤原文有一段未出现“自由”，太炎译文却两次使用了“自由”。

原文：

第一元來彼等は我儘勝手を好みて束縛に堪へざる(こと)。彼等は

① 章太炎：《消极》，《章太炎全集·〈诂书〉重订本》，第314页。为抹除日文汉字词的痕迹，国家图书馆所藏修订的《诂书》重订本将《消极》篇更名为《消道》(第316页)。《检论》(1915)最终将之更名为《无言》。正文中的“消极”则改为“消道”。(《章太炎全集·〈检论〉》，第590页)

② 章太炎：《消极》，《章太炎全集·〈诂书〉重订本》，第314、315页。

③ 《论外国待中国之现情》，《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11月14日，第2773页。

④ 章太炎：《消极》，《章太炎全集·〈诂书〉重订本》，第314—316页。

⑤ 原文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123、116页。

情慾の動物にして兎も角も速に己れ的情慾を満足せしめんと欲せしが故に、彼等は他人の利害を顧るの遑なく。却つて他人と相争ひ相闘ぐ（こと）のみなりしならん。斯かれば彼等は自ら相分裂せざるを得ず、孤獨の生涯を送らざるを得ず。^①（参考译文：第一，他们本来就不堪被束缚而喜欢任意的为所欲为。由于他们作为情欲的动物只想尽快地满足情欲，不遑顾及他人的利害。反过来，他们不只和他人相争相斗，如此一来还不得不将自己与他人相分裂，不得不度过孤独的生涯。）

太炎译文：

一以为我能自由而不受他人之约束者也。盖其人既为肉欲之动物，务于得欲，则不暇念他人，而争鬭常因以起。争鬭者，未必其果胜，不果胜则或为他人所判，而无以成自由独立之荣名，故非散处则必有自疚者矣。^②

太炎译文第一次使用的“自由”，对应于原文的“我儘勝手”（为所欲为）。日文“我儘”（读作わがまま）意为“任性、肆意”，“勝手”意为“任意、为所欲为”，二词都有以自我为中心的意思。第二次出现“自由”的句子——“争鬭者，未必其果胜，不果胜则或为他人所判，而无以成自由独立之荣名，故非散处则必有自疚者矣”，在原作中并无对应语句。这其实是太炎对他认为原文扞格难通之处——为什么说相争相斗的结果是将自己与他人分裂，而“度过孤独的生涯”的一种解释。由此可见，岸本眼中不能称为“自由”的为所欲为，在太炎看来，同样是值得肯定的“自由独立”。太炎的自信，建立在他之前通过翻译《斯宾塞尔文集》，习得了较宽泛的、往往为褒义的“自由”概念。另外，太炎的表现也印证了严复的判断。严复指出，中文里当时流行的“自繇”，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这实为“后起附属之诂”，理解“自繇”本意，应该回到“不为外物拘牵”这一最初的含义上来。^③章太炎正是以“不为外物拘牵”这一最初含义来理解“自由”。同时期太炎译《社会学》、严复译《群己权界论》、梁启超撰《新民说·论自由》，都在某种程度上试图淡化中文舆论界“自由”所含“放手放脚、掉臂游行、无拘无管、任情肆意、不怕天不怕地”^④之负面色彩。

岸本能武太根据《社会哲学绪论》来分类诸社会性质说。他首先批判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多元说”（the monadistic explanation of society）。Monadism 本于 Monad，即单子。单子是一种反映世界秩序的独特元素符号，在西方有漫长的知识史。1714 年，莱布尼茨《单子论》的出版普及了这一概念。Monadism 一词今天通

①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 年讲义版），第 116 页。

②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89 页。

③ 严复：《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严复全集》卷 3，第 254 页。

④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康有为全集》第 8 集，第 68 页。

常译为“单子论”或“单元论”。约翰·麦肯齐指出,“单子论是一种认为集合是由相互独立的部分所组成的世界观,组成集合的每一部分都有它独自的本性”。^①岸本能武太用汉字“多元说”来翻译“Monadism”,将由它导引的社会性质学说翻译为“社会多元说”,意即社会由众多各自独立的元子构成。^②对同一个对象的不同称名凸显了不同的侧重点:称之为“多元说”乃立足于由单子构成的集合体;称之为“单子论”则是立足于构成集合体的独立元子。而章太炎将“多元说”及“社会多元说”这些岸本的日译汉字词直接引入中文。另外,1902年广智书局出版太炎译《社会学》,还将岸本原文的英文说明词“Monadism”,错排为“Monadin”。^③这些都阻碍了中文世界对“社会单子说”这一概念的理解。^④

岸本不赞同单子论学说导出的极端个人主义主张,认为“是说于社会性质,其不合无待深论”,^⑤然而他对“Monadism”的详尽描摹,对于章太炎未尝没有产生“劝百讽一”的效果。将岸本《社会学》对该学说的描述,与太炎《四惑论》《国家论》等文的表述作比较,就可以窥见一斑。

岸本《社会学》称,“Monadism”主张“社会非有全体在,特有无数个人在耳。而个人亦各独立,无所依赖,本无相助,亦无求于相助……人类以社会而被钳束,致毁损自然之权利者多矣。故个人宜脱社会之裁判,以复归其自由”。此中逻辑可见于太炎《四惑论》,所谓人“非为世界而生,非为社会而生,非为国家而生,非互为他人而生。故人之对于世界、社会、国家,与其对于他人,本无责任”。^⑥岸本又说,“Monadism”还主张“独存为自然。团结为偶然,部分为实事,全体为妄言”。^⑦太炎《国家论》的“个体为真,团体为幻”,俨然同此声口。^⑧可见以英国哲学家约翰·麦肯齐著述的日语译本为中介,莱布尼茨以降西方的“单子论”学说已潜伏在章太炎思想中。

① John S. MacKenzie, *An Introduction to Social Philosophy*, New York: Macmillan and Co., 1890, p.128.

②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283、284页。岸本能武太用“多元说”来翻译“Monadism”,其考虑应该主要是与极端相反的、只认社会为实在而不认个体为实在的“Monism”(岸本翻译为“一元说”),在名称上产生对照关系。

③ 岸本能武太:《社会学》(下),章炳麟译,上海:广智书局,1902年,第20页。

④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排印出版的《章太炎全集·译文集》将广智书局版有讹误的“Monadin”错改为“Pluralism”,称“多元说即 Pluralism”(《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34页)。经笔者提醒,该社2018年出版的《章太炎全集》(19)改为 Monadism(第134页)。

⑤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35页。

⑥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22号,1908年7月10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合订影印本,第4册,第2页。

⑦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135页。

⑧ 太炎:《国家论》,《民报》第17号,1907年10月25日,第3册,第2页。

太炎 1908 年发表《无政府主义序》，从中仍能看到岸本《社会学》从人类和社会进化角度来解析人的属性，以及“乐群”与“非社会性”相偕动的命题。一方面，太炎对人的个体性——非社会性的“独居深念”、“介特寡交”^① 已有根本的承认，即他认同人有自主决定自己生命及生存方式的权力，对他者并没有天然的道德义务。彼时知识界有舆论斥言革命者不与社会相扶助、隐遁、自裁，违背了公理。太炎则抨击这种舆论乃束缚他人自主权的私见。^② 如前所述，在《明独》篇中，太炎曾对嗇夫、旷夫颇多微辞，而至此，太炎认为只要不干涉他人，就“无宜强相陵逼”。太炎思想的进境植根于清末革命的历史，这一现实促使他从秩序边缘者、抵抗者的角度来感受并重新思考人间的制度和秩序。而从斯宾塞到岸本能武太，不同时期层累叠加的个人主义理念，则使太炎的感性冲动不断得到理性上的清晰化确认，激发他赋予该理念以再理论化的表达。因此，人与秩序之思的跨洋交流，是他思想进境重要推手。

另一方面，太炎深知一旦人“乐群就众”生成“屯聚”，就必须建立“友纪条贯”的秩序规则。^③ 换句话说，社会化的过程意味着人要适度收敛天性，以适应群体的目标。沃德认为“所有的文明都是人为”。而荀学的核心是“其善者伪也”。太炎指出，“人类所公认者，不可以个人故，陵轹社会；不可以社会故，陵轹个人”。他并不倡导离群索居，但却认为应给予这种思想、言行与众不同者以生存的空间，原则是“人伦相处，以无害为其限界”。^④ 这就又回到了斯宾塞处理社会关系的“第一原理”。其实，岸本曾批评过无政府主义学说，认为“无论如何发达，人作为有限之物（的特点）无疑会持续下去”，而群居生活中，人与人会产生繁多的关系，“势必设立某种政府的必要”。^⑤ “政府安能遽废”，正是受儒教文明熏染的中日两国知识人的思想默契。^⑥ 太炎始终拒绝将无政府作为政治革命的目标，早在翻译《社会学》时就现出了芽蘖。

四、自由与秩序之思的跨洋流变及其影响

19 世纪的生物和社会进化学说，伴随形成连锁反应的“社会学”载体，在英、美、日、中等国递进传播。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各有侧重地再生产“社会学”所关

① 太炎：《无政府主义序》，《民报》第 20 号，1908 年 4 月 25 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年合订影印本，第 3 册，第 129 页。

②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4 册，第 2—9 页。

③ 太炎：《无政府主义序》，《民报》第 20 号，1908 年 4 月 25 日，第 3 册，第 129 页。

④ 太炎：《四惑论》，《民报》第 22 号，1908 年 7 月 10 日，第 4 册，第 8、2 页。

⑤ 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 年讲义版），第 376—377 页。

⑥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 155 页。

涉的自由与秩序之思，其结构颇可与古史辨派“层累说”相比拟，^① 思想学说的滋生由此呈现为一个基于内在关联不断叠加增殖的系谱。岸本能武太较准确地把握了斯宾塞社会有机体学说的本旨，其逆流而动的个人主义魅力吸引了章太炎。对斯宾塞、沃德来说，人类承袭自原人阶段、寻求扩张个人行动范围的“反社会”（anti-social）的趋向，支持了他们的自由理念。岸本能武太巧妙地用汉字“非社会性”对译反社会性（anti-social），通过强调不喜交流、离群索居的取向，来松弛个人主义带给日本社会的紧张感。而章太炎领悟到，岸本提供的“非社会性”、“消极”等论说，进一步使儒学观念中不甚光彩的“废”、“隐”等逃群举动，获得了正当价值，太炎更从中升华出以“不作为为作为”的抵抗政治，向社会大众进行呼吁。然而，投身清末的革命实践，使他对岸本略微压抑“自由”的倾向却颇不以为然。

值得注意的是，共时层面上空间边界的不稳定性和相互之间的可流动性，使历史观念横向层累的前缘构成往往较为繁复。在印刷工业兴起、跨国思想流动和交汇极为频密的情况下，更难以存在个体与个体间思想单向度的封闭传递。比如，岸本接受或反驳斯宾塞学说的知识渠道，既包括“间接阅读”沃德作品，又包括直接浏览斯宾塞原著。同时，他还接触了英语圈各种关于斯宾塞的论说，接触了日语世界有贺长雄、乘竹孝太郎等译介的斯氏作品，以及外山正一涉及斯宾塞的言论。而章太炎在翻译《社会学》之前，已译介过《斯宾塞尔文集》，了解严复所译《斯宾塞尔劝学篇》及其《天演论》中关于斯氏的评论。太炎还有意无意间涉猎了以有贺长雄为代表的日本诸多学者有关斯氏学理的著述。^② 在斯宾塞—沃德—岸本—章太炎的思想连锁“事变”（event）中——包括上文提及的周边所有“事变”，又从不同程度上影响到此一“事变”中的各个环节，“正如把几块石子一齐投到水里去，波纹互相涵融渗透”。^③ 尽管如此，不同国别的知识人，其各自的核心关切还是相对明晰的。社会学家沃德思索的是通过人为的干预亦即扩大政府职能，来纠正美国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弊端。岸本能武太倡导社会改良，并以个人主义来抵制日本国内膨胀的绝对主义对精神生活的干涉。革命者章太炎则倾心于为反清革命行动寻求理论依据。他们将随波振荡、涵融渗透的社会学思想，特别是生物、社会进化学说所支持的人的本初属性，作为权威的科学原理，有序地整合进自身对秩序的诉求之

① 顾颉刚：《古史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册，“自序”，第52页。

② 太炎《诂书》重订本的《序种姓上》《族制》《原教下》有涉及有贺长雄《宗教进化论》和《族制进化论》的内容。而这两本书和《社会进化论》皆由有贺长雄根据斯宾塞《社会学原理》和《社会学材料集》编著，于1883—1884年出版。

③ 参见贺麟：《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27页。怀特海用相关性的原理来认知“事变”（event），参见A.N.Whitehead, *The Principle of Relativity with Applications to Physical Sc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2, p.21.

中。而这种诉求又反映出当时各国的社会政治征候。

章太炎译岸本《社会学》对近代中国学术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是启发学术思想。章译《社会学》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社会学著作，向国人呈现了最为系统、清晰的社会学定义。因此时人推举“章氏炳麟之群学为巨擘”。^①章译《社会学》出版次年（1903），严复译自斯宾塞《社会学研究》的《群学肄言》出版。严复坚持以“群学”对译 sociology，认为“群”与“社会”内涵不同，“群有数等，社会者，有法之群也”。^②然而，在日译新词铺天盖地进入中国的大势之下，最终章太炎使用的“社会学”一语，在竞争中获胜，成为固定译名。继章太炎之后，经由日本引介的社会学思想不断输入中国，在近代中国思想面貌的形塑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③

另一方面是激荡个性解放思潮。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诸多仁人志士挺身而出，拯救危亡。岸本能武太承续沃德以人力来推动社会变革的理想，称“向也以个人浮于社会之潮流而随之进退，今也以个人波引社会之潮流而使其驶行”。^④个人倾力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与革命者章太炎产生强烈精神共鸣。岸本协调人类非社会性与乐群的两种属性，使得个人自由具备消极和积极两个阐发面向，这一点尤得章太炎倾心。岸本解析人的“非社会性”，意味着确认个人优先于社会而存在。此理论有利于人们摆脱僵硬纲常伦理的拘囿，构成近代个性解放思潮的重要元素。章太炎比岸本更充分肯定积极的个人自由，不怕牺牲，矢志革命，恰恰体现了“大独”合群的精神。鲁迅评价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⑤这种勇于担当的精神，对当时青年投身民族革命与社会改造运动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作者彭春凌，中国历史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 100101〕

（责任编辑：窦兆锐）

① 《浙江潮》第7期，1903年9月11日，第176页。

② 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全集》卷3，第9页。

③ 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5、275页。

④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译文集》，第59页。原文参见岸本能武太讲述：《社会学》（1896年讲义版），第25页。

⑤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65、567页。

An Archaeological Study of “Small Yellow Registers” Piloted in Chu Prefecture in the Third Year of Ming Emperor Hongwu’s Reign Song Kun and Zhang Heng(88)

Before the fourteenth year of Emperor Hongwu’s reign (1381 AD) when “Yellow Registers for Taxation and Labour Recruitment” was officially promoted across the nation, the Ming government already, in the third year of Emperor Hongwu’s reign, tested out “small yellow registers” in some southern administrations. As of now, there are only three discoveries relating to “small yellow registers”. The first is a later-edited second-hand data —the only exact historical record of this document yet known. The other two findings are “small yellow registers” originals, which are unedited first-hand cop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original “small yellow registers” not only verifies that regulations in the document had been in operation for a decade i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but also reveals “small yellow registers” content and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rural self-administration (*lijia*) system. According to the “small yellow registers”, one can basically reconstruct the complete Ming-era rural self-administration framework, and identify the system’s actual starting point and the original source of the diagram for rur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Small yellow registers” also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evolution of household and taxation management, from the Yuan Dynasty’s separation management to the Ming Dynasty’s unified management.

From Nobuta Kishimoto to Zhang Taiyan: The Freedom and Order of Cross-national Communication Peng Chunling(110)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social problems resulting from laissez-faire capitalism led to questioning of Spencer’s pro-individualism social theory and deep reflec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freedom and social order. Promoted by a great Eastward movement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ideas from European and American academia were transmitted to Japan and China through translation. However,

different countries formed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traditions, systems of discourse, political backgrounds, and scholars' personal preferences. Building on Spencer's social organism, Nobuta Kishimoto's *Sociology* used "unsocial" to describe "anti-social", meaning mankind's resistance to social order. He eased tensions in Japanese society brought by Spencer's individual freedom — but at the same time, suppressed an ever-growing Japanese nationalism. Zhang Taiyan, in his translation of Nobuta Kishimoto's *Sociology*, connected individual freedom with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s like "taoqun" (escape from crowd), "yin" (seclusion) and "fei" (abandon), demonstrating resistance to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upport for the revolution.

Japan and the Compromis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during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Cheng Honglei(132)

From the outbreak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was consistently opposed to monarchy, but, for several reasons, attitudes toward Yuan Shih-kai were not so unchangeable. Japan decided to use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War as an opportunity to bring down Yuan Shih-kai, foster pro-Japanese Chinese forces, and thereby completely control China. Japan intentionally strengthened its connections with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providing funds and military equipment to consolidate the military's strength and confidence.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s resulting even strength of determination to overthrow Yuan Shih-kai further exacerbated domestic North-South conflicts. Once Yuan Shih-kai abolished the monarchy, thereby some of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s targets having been achieved, the chances for compromise betwee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mproved. Japan increased its influence campaign on the National Protection Army, suppressing Britain's mediation efforts to further thwart any compromise. The failure of the Nanjing Meeting led by Feng Guozhang, extinguished